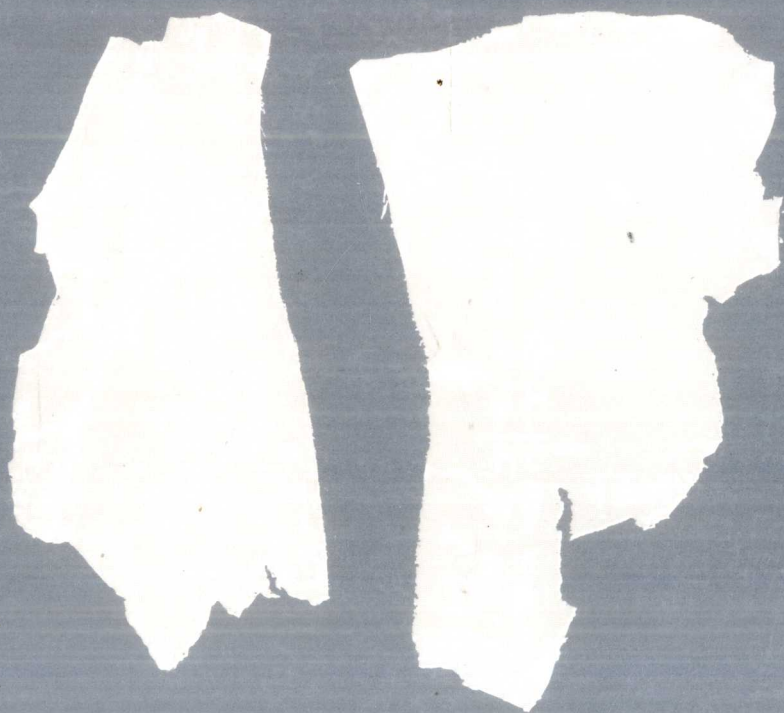


刊叢學獻文

古籍辨偽學

著 鄭良樹



臺灣大學書局印行

鄭良樹著

古籍辨僞學

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古籍辨僞學

／鄭良樹著．--初版．--臺北市：
臺灣學生；民75
面；公分．--

ISBN 957-15-0857-8 (精裝)

ISBN 957-15-0858-6 (平裝)

圖書 - 考證

011.7

86014395

古籍辨僞學 (全一冊)

著者：鄭良樹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發行人：孫善治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〇〇二四六六八號

電話：三六三三三三 傳真：三六三三三三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刷所：宏輝彩色印刷公司

地址：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
電話：二二六八八五三

定價：精裝新臺幣三一〇元
平裝新臺幣二四〇元

西元一九八六年八月二日
初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15-0857-8 (精裝)

ISBN 957-15-0858-6 (平裝)

01102

自序

古籍辨偽學所研究的應該是古籍的作者、成書時代及附益等三方面的課題，通過這三方面的研究來鑑定古籍的真和偽。所謂真，是指古籍與作者或成書時代相符；所謂偽，是指其傳聞者和它確實的作者、成書時代相乖，甚至有附益的篇章和文字。一部傳聞爲「真」的古籍，經過後人的考訂，有可能被判定爲「偽」；相反的，一部被認爲「偽」的古籍，經過後人的研究，也可能恢復其「真」的身份；因此，古籍辨偽學實際上應該包含來往的兩條研究路線，不但要研究「真」書，也要考訂「偽」書，是一門「真到偽」「偽到真」雙軌同時進行的學問。

既然是雙軌同時研究的學問，那麼，「古籍辨偽學」這個名稱恐怕就不十分理想了。這樣的一個名稱，很容易使人產生一種錯覺；只研究「真」書，並不研究相傳的「偽」書。因爲「真」書被研究並判定其爲「偽」書，所以才叫「辨偽學」；如果是「偽」書被研究並恢復其「真」的地位，那就應該叫「辨真學」呀。因此，「古籍辨偽學」這個名稱恐怕並不十分理想。

其實，在張心澂出版他的《偽書通考》時，就已經按上一個不十分理想的名稱了。研究一部

古籍的作者、成書時代及附益的問題時，最終的結果可能被判爲「偽」，也可能再次被肯定爲「真」，這兩種情形都同時存在的，那麼，我們怎麼只能夠根據「真到偽」一邊的路線而按上名稱呢？清代姚際恆撰《古今僞書考》時，情形和張心澂不相同，他進行的確實只是「真到偽」的單線研究而已；翻開《僞書通考》，所匯進的却包括了來往兩線的資料，那麼，因襲舊名「僞書」恐怕就不太理想了。

梁任公將他在燕京大學一系列的演講稿訂名爲「古書真僞及其年代」，應該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名稱，至少它不會讓人產生單軌的錯覺。如果將這門學問改稱「古籍真僞學」，也許會比較理想一些，至少它已經表達了「真到偽」「偽到真」的雙軌研究。然而，這樣的修改可能會產生下列的問題：

第一、如果「真」「偽」二字當名詞來用的話，「真」指沒有問題的古籍，「偽」則反之。然則，過去長期以來在真僞存疑之間、富有爭議性的古籍，稱它爲「偽」固然略有委屈之嫌，但是，可以改口稱「真」嗎？顯然是不可以的。因爲「偽」字可以涵蓋真僞存疑，而「真」字却不能。如此一來，「古籍真僞學」的「真」字豈不是要落空了嗎？

第二、如果「真」「偽」二字當兩個平行的動詞來用的話，那麼，就等於說是「古籍真學」及「古籍僞學」的合語了。「古籍真學」、「古籍僞學」似乎也說得通，但是，總沒有「古籍辨真學」、「古籍辨僞學」來得恰當和順口，因爲「辨」似乎是不可或缺的一個字。龐樸就寫過一篇論文叫《公孫龍子辨真》（見《文史》第四輯），至於以「辨僞」爲名的論文及專書，

就多得不勝枚舉，可見還是「辨真」「辨偽」比較習慣一些。

「古籍真偽考訂學」恐怕是對古籍真偽雙方最「大公無私」的一個名稱，而且語義既明確又清楚，但是，缺點是名字實在太囁嚅，不夠精簡。因此，與其含糊和囁嚅，還是沿襲精簡而不十分理想的舊名，然後，再加上「古籍」二字，把鑑別真偽的範圍限定在古書內。

這門學問雖然發軔於漢朝，却要到明、清才開始成熟，並且受到大用的重視。民國初年，在古史辨學派的推動下，在學術界佔着相當重要的一個席位，在某種程度上支配了古史的研究。梁任公於民國十六年完成了《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張心澂於民國三十九年編成《偽書通考》，卷端附有總論一則；到了這個時候，這門學問才出現比較有系統的理論著作及參考工具書，讓學者們依循漸進。

雖然如此，它在學術界應有的地位似乎還沒正式被賦予。當我們研究某一問題涉及古書真偽時，頂多把梁任公及張心澂的大著拿來翻一翻，模擬其方法，翻檢有關資料；很少人檢討這些辨偽方法的可靠程度、極限，也很少人考慮到在進行辨偽時應當保持一種怎樣的態度，更很少人通過批判的方法去反省及鑑定前人的結論。此外，俯視海內外各大學中文系及研究所的課程，除私立文化大學開列有「辨偽學」外，不見各大學添設此課，那麼，它在學術界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晚近數十年來，在古史辨學派的鼓動下，古籍辨偽學固然日益顯現其重要性，却也不能避免地受其影響而走到一條激進的路子上去。在此風氣籠罩之下，許多古籍都被打進冷宮，

成爲「千夫所指」的偽書，使我們蒙受許多無法估計的損失，也讓我們的古籍蒙受許多不明白之冤。邇來地下出土資料愈來愈多，更加證明前一、二代某些學者在辨偽態度及方法上的偏差，如何廓清真偽的界線，如何抱持辨偽的態度，以及如何建立新的理論等等，似乎是導引這門學問走上客觀的路子所應有的工作。惟有在客觀的、科學的及心平氣靜的研究之下，我們的古籍乃至於歷史、文化等，才能免於冤屈。

四年前秋天，良樹很榮幸地回到自己母校國立臺灣大學客串一年，在研究所裏開設了這門課，除指導學生從事辨偽的實習外，也講一些理論上的問題。良樹自愧書讀得不多，見解也很平凡，對學生沒有甚麼助益，有負母校的厚望。離校之前，將所帶去的資料編成《續偽書通考》，聊作張心澂大著的續篇，已由學生書局出版。回來後，又花一些時間，將課內所講的加以整理，分章分節，寫成這本小書；至於實習部分，則全部刪除以省篇幅。這本小書只能當作這門學問的進階而已，不敢云學術耳。發凡起例非易，增補修訂有待來日，尚祈專家學者有以教我。

良樹數十年來，承恩師王叔岷教授扶掖提携，師恩如山之重，如海之深。數年前，王師退休新、馬，回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續任研究員，山河阻隔，無法隨侍，更無緣再獲親炙。南陔荒炎，思慕再三，謹以此書爲王師七秩晉二壽，並祝王師冬夏青青，健壯如昔。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王師壽辰，鄭良樹
序於馬來亞大學文學院第二四研究室

古籍辨偽學

目錄

自序	I
第一章 成立及其研究範圍	一
附論：偽書產生的原因	二四
第二章 意義及其學術地位	三一
附論：辨偽的發生	五九
第三章 源流(上)	六三

第四章	源流(下)·····	八五
附論	唐人的辨偽學·····	一〇九
第五章	方法·····	一一五
第六章	方法的檢討·····	一四一
附論	辨偽的態度·····	一六〇
第七章	示例·····	一六五
第八章	新趨勢·····	一九一
第九章	專著簡介·····	二二三
附錄	有真偽問題之古籍一覽表·····	二六一

第一章 成立及其研究範圍

任何一門學問，都有它孕育和成長的過程。在孕育的階段中，它可能是另一門學問的附庸，由於理論未完成、價值未顯露，它暫時沒法獨立，形成自己的王國。歷史逐步發展，時代愈來愈進步，而學問的分科也愈來愈精細，原本蔚為大王國的一門學問，或者原本併合幾個小城邦的大學問，後來逐漸離析獨立，離開了孕育的階段，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建立起自己的理論、方法和價值。有的學問發軔得早，很快就獨立為國；有的學問却需要相當時日的孕育，才能呱呱墜地，形成自己的天地。

古籍辨偽學無可置疑的，是屬於後者；它孕育自西漢，或許更早的先秦，然而，它却經過很長時期的懷胎，才得以完成自己的血肉和骨骼，與其他的學問，並立於天地之間。

遠在西漢末年，劉向已經擁有辨別古籍真偽的能力和辦法。劉向的著作雖然絕大部分已亡佚，不過，班固《漢書·藝文志》却被公認為保存了他重要著作《七略》的大部分本來面貌。透過《漢書·藝文志》，我們可以窺見當日古籍辨偽和目錄學的關係；茲引數條以明之：

《諸子略》小說家有《黃帝說》四十篇，《注》云：「迂誕依託。」
《諸子略》雜家有《大禹》三十七篇，《注》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
道家有《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兵書略》陰陽類有《封胡》五篇，《注》云：「黃帝臣，依託也。」

或云「依託」，或云「似後世語」，都莫不顯示出他辨別古籍真偽的能力。在這個時候，古籍辨偽和校讎、版本一樣，都沒有自己的園地，僅附庸孕育在目錄學這面大旗幟底下，情形就好像過去形體、聲韻及訓詁附庸孕育在文字學底下一樣。

西漢末年，雖然古籍辨偽的事件時而發生，例如《論衡·正說篇》云：

東海張霸按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書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

張霸獻呈《尚書》百兩篇，被辨認為私門偽造，是當時一件大事。梁任公《古書真偽及其年代》^①又記載了兩件事，云：

當馬融、鄭玄正在融和今古文，注解三《禮》、《尚書》……的時候，鄭玄的弟子臨孝存却根本不相信《周禮》，說是「末世譎亂不經之書」，專門做了十論七難來辨別《周禮》不是真的。……另外，何休也曾經說「《周禮》是六國陰謀書」。

兩人都異口同聲地對《周禮》的真偽表示懷疑。儘管如此，這個時期的古籍辨偽，似乎還是經學或漢學的胚胎而已。

到了隋、唐，情形也似乎沒轉變。《隋書·經籍志·孝經類》及《孝經類·小序》分別說：

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傳，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

再如顏師古，他在注解《漢書》時說：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非今所有《家語》^②。

（《調言》十篇）說者引《孔子家語》云：「孔穿所造。」非也^③。

今有《西京雜記》者，其書淺俗出于里巷，亦不知為何人所作^④。

在他們的腦海裏，古籍辨偽不過是目錄學的一條小溪流，不過是個別零碎的一門小學問而已。

劉知幾《史通》有《疑古篇》，似乎是古籍辨偽的重要著作，顧頡剛即將它編入《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內，其備受重視，於此可見了。然而，仔細推敲研究，這個胚胎却還處在古史考辨和古經訓說的夾縫中，沒到達瓜熟蒂落的地步。試觀他在《疑古篇》所舉出的十條「疑事」，除了第四條「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偶而涉及古籍真偽之外，其他九條所討論的，都正如他在篇末所說：「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說，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覈……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惟繁約不類，固亦向背皆殊。」古書和近史頗有歧異，所以，他依據各種異說，研覈董理，參會疏通，使學者知古書之妄及古說之虛，如此說來，他是在考辨古史和訓說古經，而不是在辨別古籍本身的真偽了。

劉氏在《疑古篇》裏一再批評一些古籍，他批評《左傳》是「左氏之爲傳也，雖義本釋經而語雜他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批評《周書》是「夫《周書》之作，本出《尚書》，甚至對一般的古籍，也作「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簡。』推而言之，則遠古之事，其妄甚矣」的批評，不過，他所批評的只是這些古籍裏所載的古史，而不是這些古籍本身的真偽問題。

《史通》又有《申左篇》及《雜說》上下，都是討論古史真偽的文章，和古籍辨偽沒有

多大的關係。雖然《雜說》下說：

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中，斯為謬矣！

討論了李陵集中《與蘇武書》的可靠性，算是辨僞學的範圍了；不過，由於單則孤篇，並非全書重點所在，所以，也就無法完成這個胚胎的哺育工作，更不要說讓它降生人間了。

柳宗元對子書及《論語》一系列的考訂文字，是最令人注意的了。他考辨《列子》、《文子》、《論語》、《鬼谷子》、《晏子春秋》、《亢倉子》及《鶡冠子》等，一直到現在，還是學術界所樂於徵引的對象。是他，從西漢以來第一位專門為幾部古籍寫下一系列的辨僞文字；也是他，第一位將一系列古籍辨僞的文字從目錄學、經學及注疏學獨立出來，彙為一個完整的單位。從這觀點來看，我們就瞭解柳宗元這一系列文字在古籍辨僞學史裏的地位了，更何況其中不少論點，時至今日還是相當正確。柳宗元這一系列的文字，似乎不光是為古籍辨僞而寫的，試讀下列幾則文字：

（辨《列子》）……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

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辨《文子》）……然觀其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辨《晏子春秋》）……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這三段文字雖然只佔一小部分，不過，却也可以證明柳氏這一系列考辨文字，並不單為古籍真偽而發的。我們應當說，柳宗元在寫這一系列文字時，腦筋裏恐怕存着兩股意念：一方面要以目錄學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一方面要以古籍辨偽來「識古書之正偽」^⑤，而後者所佔的比重比較大些。如果這個說法成立的話，古籍辨偽學到了中唐柳宗元的手裏，寢寢乎恐怕有獨立成為一門專科學問的形勢了。

一直要到明代的宋濂和胡應麟，古籍辨偽這幼嬰才呱呱誕生，古籍辨偽的名義才正式成立，為學術界所公認，而後才正式成為一門獨立的專科學問。宋濂完成了一卷的《諸子辨》，開章明義即說：

先王之世，道術咸出於一軌，此其人殊何？各奮私知而或鑿大道也。由或鑿大道也，

其書雖亡，世復有依倣而託之者也。然則子將奈何？辭而辨之也。曷為辨之？解惑也。

胡應麟寫了三卷的《四部正譌》，《引語》說：

唐、宋以還，贗書代作，作者日傳。大方之家，第以揮之一笑，乃銜奇之夫往往驟揭而深信之。至或點聖經，廁賢撰，矯前哲，溺後流，厥係非眇淺也。余不敏，大為此懼，輒取其彰明較著者，抉誣摘偽，列為一編。後之君子欲考正百家，統宗六籍，庶幾嚆矢。

這兩段文字，清楚地宣布了古籍辨偽學的獨立性格，它不再如漢、唐及宋的學者，是目錄學、經學或注疏學的附庸。誠如梁任公所說的：「明初宋濂著《諸子辨》一卷，辨別四十部子書的真偽。從前人往往在筆記文集或書目中帶說幾句辨偽的話，沒有專著一卷書來辨許多書的偽的，宋濂却和前人不同。我們可以說，專著一書以博辨群書的，宋濂是第一個。……晚明出了一位辨偽大師，叫做胡應麟，著了一部《四部正譌》。宋濂的《諸子辨》不過是文集裏的長篇文章，仍舊放在雜著之部，而且沒有博辨群書的真偽，發明通用的方法，還不算專書。專著一書去辨別一切偽書，有原理有方法的，胡應麟著《四部正譌》是第一次。他所辨的書，固然不多；他所辨別的真偽，固然不能完全靠得住；但經史子集四部的書，大都曾經過他的研究

而可供後人的參考。⑥」尤有進者，胡應麟在《四部正譌》卷上的卷首裏，還爲文討論偽書的二十種情形，他說：

凡贋書之作，情狀至繁；約而言之，殆十數種。有偽作於前代而世罕知之者……有偽作於近代而世反感之者……有掇古人之事而偽者……有挾古人之文而偽者……有傳古人之名而偽者……有蹈古書之名而偽者……有憚於自名而偽者……有恥於自名而偽者……有襲取於人而偽者……有假重於人而偽者……有惡其人，偽以禍之者……有惡其人，偽以誣之者……有本非偽，人託之而偽者……有書本偽，人補之而益偽者……又有偽而非偽者……又有非偽而實偽者……又有當時知其偽而後世弗傳者……又有當時記其偽而後人弗悟者……又有本無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偽託者……又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偽題者……

把偽書作偽的情形，條析爲二十種，至爲精細，且影響後世至深。此外，他又在卷下的卷末裏，爲文暢論「偽書多怪字」「覈偽書之道」「四部書之偽者」以及真偽程度的各種問題。很明顯的，胡應麟在《四部正譌》裏，已經爲我們指示出古籍辨偽的獨立性來——它有學術個性，有研究方法，也有專業理論，不再是依附在其他學科底下的一門零碎小學問。雖然他所提出的理論還不十分完整，所已知的方法還不十分嚴密，對於它的學術個性，也還沒拋鑄